



【窥海斋】

## 马也有乡愁

□林少华

乡愁。我原以为是人才有乡愁。而读了《读者》今年第二期席慕容的文章，始知马也有乡愁。那是2014年席慕容去内蒙古博物馆演讲时一位教授讲给她的。

1972年，越南。一位来越南开会的内蒙古画家同许多与会艺术家在海边一片草地上聊天。正聊着，发现远处有一匹马一边吃草一边不时地抬头望他。忽然，那匹马径直朝这位画家急急走来。画家仔细打量马，一匹白马。虽然身上很脏，但画家还是认出那是一匹蒙古马。大家想拦住这匹马，不让它靠近。奇怪的是，马尽管骨瘦如柴，力气却大得不得了，不顾一切地来到画家身旁。这位西装革履的内蒙古画家激动万分，搂住这匹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蒙古马，摸它的头，拍它的脖子，连声说：“你怎么认出我来的？你怎么认出我来的？”

显然，这位内蒙古画家唤起了这匹马的久远记忆——马知道画家来自它的故乡内蒙古草原，亲近之余，热切希望画家把它带回故乡。可惜画家当时没有能力满足马跟他回乡的愿望，只能泪流满面地久久摸它、拍它。后来画家在回忆录中用很大篇幅表达自己对这匹马的愧疚之情，并把这匹蒙古马的乡愁讲给所有内蒙古同胞。

乡愁！马犹如此，人何以堪？

乡愁来自记忆。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三位得主发现人的大脑中有神秘的“杏仁核”和“海马回”。前者管情绪，后者管记忆——记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出生后的记忆，另一部分是出生前的记忆，即先祖以来层层积淀的记忆，大约相当于瑞典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换个说法，一部分记出生后的自己，一部分记出生前的自己。这也让我理解了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一次感动。

1998年我趁济南开

会之机延伸来到青岛，第一次来青岛。尽管是第一次，而感觉上却好像来过许多次。一切都那么熟悉，无论海边渔村错落有致带小院的青砖民居，还是旅馆附近山坡的野花荒草和成片刺槐，都给我以恍若儿时梦境再现的久别重逢之感，温馨、缱绻，让人不忍离去。现在我从科学上明白了，那应该就是海马回使然——储存在海马回中的先祖记忆倏然复苏！

我祖籍蓬莱，和青岛同属山东半岛。按理，对于在东北腹地长大的我来说，渔村和刺槐都与出生后的记忆全然无涉。而渔村和刺槐此刻却成了我和祖先之间的中介——不知多少年前生活在半岛的先人通过它们向我发出呼唤，呼唤我回归山东半岛。现在我想，彼时的我可能就是那匹蒙古马，对来自故乡的信息涌起无可抑制的乡愁。事实上，转年我也终归从广东北上山东，从广州调入青岛。或许真像席慕容所感慨的，“无论走到哪里去，那个故乡都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大概也正因此，村上春树才说“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表面上说法截然相反，而实质上应是同一回事。

当然，乡愁更多的还是来自出生后的记忆，尤其是小时的记忆——或是周围开满篱笆的紫色牵牛花，或是房后缀满黄杏的歪脖子杏树，或是门前那棵月上梢头的垂柳，或是村外和小伙伴捉迷藏的干草垛，或是母亲的一碗荷包蛋手擀面……遗憾的是，这些记忆承载的乡愁已经被我们赶出记忆很久，很久很久了。因我们对灯红酒绿高楼大厦的向往，因我们对西装革履珠光宝气的迷恋，因我们对房子车子票子位子的不懈追求……

这固然不错。中国人当然也有获取这些、

享受这些的权利，无可厚非。时至今日，应该说，对于为数相当不少的城里人来说，这些已基本得到满足。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居民自不必论，即使青岛市民，物质生活条件也未必亚于欧美等一线国家。近几年甚至觉得国内消费意犹未尽，而开始去外面吃喝玩乐，一掷千金。可是吃喝回来，游玩回来，“爆买”回来，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似乎有个空洞等待什么填充。那个空洞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一半是乡愁——渴望得到抚慰的乡愁。而能够抚慰乡愁的，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在伦敦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不是塞纳河、富士山和美国迪士尼乐园，更多是本土寻常风光：小桥流水，春雨杏花，白杨垂柳，炊烟晚霞，以及石板路、木棍窗、轱辘井、四合院……一句话，是家乡记忆，是故园山水。在这个意义上，以京沪为例，上海市郊的朱家角比外滩和南京路还要珍贵，北京的老四合院也肯定比央视“大裤衩”宝贝得多。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或许是对的。这位西方人曾经断言：“最终影响人们的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和人们密切相关，人们也愿意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是忠诚和家庭、血缘和信仰。”亨廷顿将这些称为文明。对于我们中国人，这种文明即是传统文化，即是国学。那也是保证我们在“文明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海马回先祖记忆和文化基因。

传统历书中的今年是丁酉鸡年。南宋士人韩元吉词：“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乡关何在，乡关何处，这大有可能是当今我们所有人挥之不去的世纪性乡愁。换言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匹急欲回归内蒙古草原的马……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 绵长的旧体文学和迟出的新文学

齐鲁晚报特别邀请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万华先生开设“香港百年文学史话”专栏，以飨读者。国文学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而在割让、租借、回归中展开的香港历史，又使得香港文学获得了属于香港土地的独特性。之都，并成为全世界经济自由度最大的城市。这一巨大变化联系着中国百余年的历史，使得发生在香港的文学始终是“易中心”的“贫瘠之岛”，英政府甚至为此撤销了负责与清王朝谈判签订条约的公使。百余年过去，香港发展成为全球贸易编者按：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2023年香港岛被割让时，是个连英国外交大臣也视为“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的“贫瘠之岛”，英政府甚至为此撤销了负责与清王朝谈判签订条约的公使。百余年过去，香港发展成为全球贸易

□黄万华

【香港百年文学史话①】

早在1816年，“英国人笔下便已经出现‘香港’这个名称了”，而“香港”是通过旧体文学首先进入中国文学。香港被割让十余年后，其市政建设得以较快开发，开始形成商业城市，吸引四方来客。途经香港的文人士子，如魏源、黄遵宪、何绍基等都曾以“香港”为题赋诗作文，而1862年为逃脱清政府通缉而避居香港20年的王韬是第一位内地居港文人，也是香港开埠后第一位汉语写作的作家，“被封为香港文学的鼻祖”。

1874年，王韬创办香港首份中国人出版的报纸《循环日报》，报纸分“庄”、“谐”两部，“庄”发表新闻，“谐”发表诗词、散文、小说、粤曲，就是副刊，这被视为香港文学的起点。王韬自己也在《循环日报》等发表众多旧体诗文。他自言“我诗贵笃挚”，“从未区宋唐”，“但知吟乱杂，不能饰平治”（《我诗》）。其诗文于香港文学最有价值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第一次表现出香港这样远离王朝中心的“边缘”区域所具有的变革动力。《赠日本长冈侯护美，时方奉使荷兰》一诗在与日本友人酬答中最典型地表达了王韬的变革思想：针对日本“入欧脱亚”的“维新”“盛业”，他告诫，“泰西学术固无匹，舍短取长在今日”，但也要清醒于“仿效不徒袭皮毛，富强岂止恃戈甲”；而对于“中东异地原同源，点画文字师篆隶”的中日两国，更要“深知驭远在睦邻”。王韬还出版传统笔记小说《遯窟谏言》《淞隐漫录》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之归于“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然所记载，则已鬼狐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一时传布颇广”。

如王韬那样，以旧体诗文表达进步、变革思想的，在香港旧体文学有成者中为数众多，如“晚清香港文坛首屈一指的大家”潘飞声，其诗文充满变革心愿、爱国情怀。晚清更有一批革命党人，聚居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唯一趣报》等，均设有文艺谐部，诗词专栏往往专刊革命党人诗词，如年少师从梁启超的郑贯公1901年赴港后参与多家报纸的创办，视报纸如同密友：“歼贼义勇队，诛奸有笔锋。无形义勇队，吓煞叩头虫。”清楚表明了革命党人以旧体诗文为歼贼诛奸之利器，张扬反清革命的立场。其他旅港人士，如商界的陈步墀、梁澹等，其诗词也从不同侧面体现时代特色。可以说，香港旧体文学与新文学并无根本性冲突，甚至参与了新文学的某种进程。

香港旧体诗文还最先在民间文化的层面上显示了香港本土特色。晚清民初，香港新界地区文人的创作被视为“香港最纯正的本土文学代表”，许永庆、黄子律等众多文人在新界办学教学，传授传统文化，其诗以乡居生活传达香港气息，朴实清新。民初，“号称声名文

物之乡”的新界上水地区乡民子弟成立上水青年诗社，出版《上水诗社集》，创作耕读题材诗词，继续倡导国故文学。对于香港被殖民化的命运，香港本地诗词也留摄了种种历史面影。如1898年，英人强占新界，当地乡民奋起反抗，遭残酷镇压，伍星墀之诗句“生能抗敌非文弱，死不惊人岂丈夫”，邓惠麟之诗句“五马有刑惩汉歹，九龙无界限英夷”，都以亲历者体验，慷慨悲歌，“继承岭南雄直诗风，推为早期香港本土文学的杰作”。这些创作，都从乡土文化层面包含了香港文学最初的特色。

香港新文学源自“五四”新文化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香港多中文报纸予以政治上的呼应，大批新文化书籍输入香港。但旧文学一时在香港还占主导地位，香港新文学甚至比台湾新文学都要晚出。1907年，香港开始有文学期刊，如《小说世界》《新小说丛》《双声》等，但文体都是旧体或“鸳鸯蝴蝶”。香港报纸也通用文言文，大约到1925年后，香港报纸副刊陆续刊出白话文作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27年鲁迅三次访港成为催生香港新文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其2月访港时演讲了抨击封建主义愚民政策的《无声的中国》和揭露殖民当局似是而非的偏好的真实用意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演讲时由许广平“翻译”成粤语，听讲者甚多，效果极佳。鲁迅演讲中发出了“我们此后实在只有这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的号召，在香港民众中直接播撒了新文学火种。当时给鲁迅演讲作记录的刘随日后回忆说，鲁迅对香港新文化的前景充满希望，“他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并且还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香港的青年们”直接受到鲁迅演讲影响，开始脚踏实地“去做文学革命的工作”。

1927年，孙寿康创办香港第一家新文学出版机构——香港受匡出版部。几乎同时，《工商报》在留学欧美回来的黄新彦、袁振英主持下，开辟专门发表现代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副刊。其中袁振英自小居港，1915年就读北京大学后，成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深度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在受匡出版部出版的《实社丛书》十余种皆为近现代西方启蒙文化译介之作。1928年8月，被认为香港第一本新文学杂志的《伴侣》创刊，同年问世的《字纸簏》“文章风格尖锐明快，有些像《语丝》”，不妨可看作鲁迅影响的发生。至1933年，香港先后发行的新文学刊物有近20种，香港新文学由此展开。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孔昕